

【思想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与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

商原李刚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一个非常意义的新问题。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杨弃;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3-0001-04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prehensive pioneer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SHANG Yuan li 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Chinese thoughts and culture and its modern effect and further to search the deep rel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mprehensive pioneering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sublate; comprehensive pioneering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一个非常意义的新问题。

一、政治文化研究政治行为的取向性模式

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当代政治学的最新视角之一。它从政治行为的取向性模式方面,深入揭示政治现象的总体特征和深层结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能深入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初看起来,“政治文化”是老观念的新名词^[1],但“政治文化”是从研究政治行为开始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政治文化”

理论,是行为主义末期即20世纪50~60年代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不能忽视政治系统内成员的政治行为的主观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再次受到关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走向了新的阶段。

“政治文化”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1956年在《政治杂志》上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指对政治客体的情感、态度和信仰的取向性模式。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

收稿日期:2004-07-05

作者简介:商原李刚(1967-),男,陕西商州人,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2]

这一概念从产生起就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总的来看,这些定义基本上都是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展开的。国内学者的定义显然有泛化的倾向,一种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和政治制度;一种认为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一种认为只研究政治心理层面^[3]。其实,政治文化起初就是一种行为主义视角,从政治行为进而研究政治心理与行为模式,这是政治文化的主导理念和研究范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只有经常而明显地影响政治发展的那些态度和情感,甚至许多非政治信念,如对人关系的基本信任感以及世界观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政治发展,也应该纳入政治文化范畴。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专指政治心理或政治行为取向,时间上基本限于现代。但美国学者派伊等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及美国学者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4]一书,基本突破了西方学者政治文化研究的界限,出现了政治文化研究上的“非西方化”倾向。

阿尔蒙德所开创的政治文化理论,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传统政治文化研究能揭示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学术范式之争的深入,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模式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冯友兰所开创的“选出而叙述之”的“中国哲学史”^[5]研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思想文化史料中剪裁出符合西方的“哲学”标准的部分,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概念、体裁、结构等,写成西方式的“中国哲学史”,其削足适履的人为痕迹是明显的,离中国思想文化有很大距离。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七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一卷)(1998年)的“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中把这一问题明确地提出以后^[6]，“中国哲学史”学术范式之争更为激烈。

近代以来,哲学研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核心。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中国、印度以及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有作为其文化精神和最高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哲学’则是西方思想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虽然这一形式的确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7]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黑格尔明确地做

出了“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的断言。^[8]尽管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但严格说来,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换言之,“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学术范式之争就是要求我们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立场,尊重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话语体系。西方哲学是一种无法也没有必要回避的参照系,但若一味从“哲学”角度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就会把中国思想文化看成一种纯粹的哲学思想,脱离中国思想文化的性质和特点。

但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吗?汉代学者司马谈和班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政治性质看得最为清楚。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的开头就说: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9]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皆出王官”说,并认为: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逢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10]

韦政通进而认为先秦诸子:

支持他们生活最强烈的因素是用世,是直接参与政治并影响社会,他们对政治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能遇明主采纳他们的意见、实现他们的抱负,才是人生最大的愿望。^[11]

刘泽华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中也大胆断言:“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12]这些都有足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政治文化中心性质。

政治思想研究是研究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哲学史研究的延续。但是,政治主张与政治行为及实践是有距离的,从政治行为及其取向性模式进行研究,能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审美理想等,与政治态度、个性追求、生活方式等及社会背景全面地整合起来,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从而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是扬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前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但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已逐渐解构。只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解构是在非常态下完成的,外力的影响发挥

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解构是分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表层的“保护带”迅速瓦解,另一方面,深层的“内核”却未受到全面冲击。这种现象,可概括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死而不亡”现象。因此,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民本,从民本到民主的发展过程。在春秋战国以前,神学本位,并孕育出了周公的尊天、敬德、保民、慎罚等德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思潮兴起,民本思想的价值取向直到清代还在影响中国社会。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兴起,民主观念逐渐萌芽。民与君,何为主?何为客?这一问题已具有了近代的意义。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思想涌入中国,但如何在中国扎根,如何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相结合,仍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死而不亡”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

那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硬核”(拉卡托斯用语)难道不可消解?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硬核”的超稳定性是相对的。任何文化系统,都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的特点;系统一般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文化系统更为明显。只是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有的结构逐渐稳定,出现了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现象。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没有从内部动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硬核”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从正面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硬核”,从而全面“扬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综合创新”,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疆土、政令、思想的统一);二是王权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君参天地;君是治乱的枢纽和决定力量;君统属一切的权力;君是真理的裁决者);三是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四是道德评价标准(评价政治人物、政治行为及目的);五是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六是经学政治思维^[3]。在这些政治思想的背后,包含着一系列的政治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的支持:首先是天命论这一精神支柱;其次是经学指导思想;再次是纲常论这一政治纽带;还有民本论这一基石。这些“稳定结构”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从“臣民文化”到“民主文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这些

“硬核”的形成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其解构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其解构与重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其“硬核”的创造性转化,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并不是钢板一块。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中,其主干是法治、德治及道治文化。这三者之间,就有一个左、中、右的分别,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政治文化取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民本”为基石,但其实质是“君主民本”,在“君主民本”的背景下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是有冲突的。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系统内部的矛盾关系,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综合创新”的出发点。

四、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研究,有意无意地贴近政治文化视角。《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刻意》、《庄子·天下》、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等,都是从政治态度及政治行为取向角度入手的。只是到近代以后,哲学思想分析、文献训诂、政治思想研究取代了政治态度及政治行为取向分析的视角。因此,政治文化视角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自发的传统。但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视角有其内在的局限:第一,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体现在由“注”到“疏”、由“集解”到“正义”的变迁中,缺乏近代以来“系统的研究”。第二,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倾向的描述上,缺少近代以来“证明的方法”。第三,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批评往往是“党同伐异”的态度,缺乏“平等的眼光”。第四,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不分正史与神话、不重历史与源流,缺少“扼要的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创新的良好起点;进一步弘扬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也非常需要近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科规范。

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呢?首先,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是历史的选择。事实证明,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还很年轻,需要不断完善。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的宝贵资源。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离不开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这一参照系。一方面是大胆吸收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只有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才能转换成现代话语系统,获得自己的话语地位。

再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经是“中国化”的政治文化,问题主要在于“现代化”。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解构和重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从而尽快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及政治文明建设呢?借用蔡元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话来说,就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目光”、“系统的研究”^[14]等范式。

首先,确立“平等的目光”,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准确定位。政治文化研究视角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视角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对政治行为及其取向性模式的研究,能比较贴切地揭示中国思想文化的性质,因而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最新的视角之一。尽管它不能代替其他研究方法,但却可以整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其他方面的成果,从而实现“综合创新”。

其次,采用“扼要的手段”,完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学科规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史料庞杂,需要胡适当年“截断众流”的手段,在“臣民文化”的大背景下,从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入手,明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限度。因此,借助于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扼要的手段”,我们会看到许多被忽视的方面。

再次,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证明的方法”,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现代化。政治文化研究主要采用抽样调查法、面对面访谈法、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法这三种基本方法。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只能采用历史与文献研究法,不能用实地调查、个案调查方法。但本尼迪·肯特对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的考察特别是派伊、墨子刻对中

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多是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如果能采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如知识分子、农民等的政治态度的实际调查和个案调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重视“系统的研究”,不断提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水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散见于各种评论、注解文字中,难于走向深入。胡适所开创的“系统的研究”传统,已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就,为我们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系统化提供了基础。

总而言之,从政治文化研究视角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尽快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综合创新和政治文明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2] 阿尔蒙德著,曹沛霖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3]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4]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7]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9] 司马迁.史记(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9.
- [11]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12]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3] 王瑞民,宋清秀.中国文化简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14] 胡适.胡适学术论文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杨彬智]